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群言典藏

费孝通

张冠生 著

(上)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费孝通

FEI XIAO TONG

上

张冠生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全2册/张冠生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2. 11

(民盟历史文献)

ISBN 978 - 7 - 80256 - 381 - 0

I. ①费… II. ①张… III. ①费孝通(1910~2005)
—传记 IV. ①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5681 号

出 版 人	范 芳
责任编辑	樊 伟 陈 佳
装帧设计	群言艺术设计中心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pbs@126.com
总 编 办	010 - 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 - 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 - 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 -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20.25
字 数	415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6 - 381 - 0
定 价	69.0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破坏的危难之际。民盟以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尊重思想自由、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民盟凝聚了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可谓群贤毕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闻一多、李公朴、梁漱溟、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吴晗、费孝通……这些民盟前辈精英们纵横捭阖、开阔放达，本着知识分子的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奔走国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和主张，将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在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动荡岁月里，历史的浪潮将中国民主同盟，将有志于民族振兴的贤良才俊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为历史的进程，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将自己的荣辱与民族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繁荣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在和平盛世的今天，为了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财富，为了让后人记住先辈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他们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奋斗事迹，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积累，出版了《民盟历史文献》丛书，这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让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盟历史文献》丛书的出版，是对先贤们多党合作历史的尊崇和传承。

《民盟历史文献》编委会

叠印的背影

—

这是一部全景式的传记，分阶段呈现了传主一生的历程。

我不用“传记文学”四字来定义此书，乃出于我对此书“传”性品质的敬意。

倘言文字水准表明所谓“文学性”水准的一方面；那么我觉得，此书的文字水准是上乘的——一种避免炫丽，直取简朴的文字风格。

文字炫丽的传记之书我是读过一些的，每有种印象那就是——“传”性的“真”与“实”，往往被文字的“华”与“采”所稀释了，“炫”宾夺主。最终，只能认为自己读的是“文学”，非严格意义上的“传记”。

而本书作者不然。

分明的，他为费老写传，“尽力求真”遂成宗旨。

故我读到的一行行文字，传性及史性含金量高，客观组合言事，摈弃主观臆测。故，“真”多也，水份少，无杂质。至于感

悟,被视为思想权力,谦恭地留给了读者。

而这一点,依我看来,正是严格意义的“传记”与“传记文学”的区别。

本书作者深谙此理,克己而为,证明了他之目的无私,纯洁。故敬之。

二

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费老“是一部已载入史册的无字大书,其生命几乎跨越一个世纪”。

写这样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无角度不能成书,且足成厚重之书。

而本书作者所选的角度,乃是“尽量还原传主的文化生命史,以及与其相伴的一段社会变迁”。

每一个人都有生命史。

却非每一个人都有堪称“文化生命”的生命史;尽管不论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人,大抵也皆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

有文化的人都未必有什么“文化生命”可言;因为也许他或她的生命只不过被不同的文化不同程度地所“化”,却对文化无所回报。

而费老却是一位生命过程不但被古今中外之文化精要“化”透彻了,而且对文化的回报也是丰富优质的。

对于这样一位已经逝去的文化垂范者,“尽量还原传主的文化生命史”,体现出本书作传者对费老“文化生命”价值的真

诚仰慕；也是对读者最有意义的奉献。

在文化乱象丛生的当下，如此这般的写作理念，是一种庄严的态度，亦需具有深厚的情怀。

我据此点认为，费老生前所一再倡导的“文化自觉”，起码深深地“化”了作传者。

是以，又敬之。

三

也诚如自序中所言，此书着实地反映了与费老之文化生命“相伴的一段社会变迁。”

近来我时常感叹许许多多当下人的视域之窄，视线之短。

“回顾”一词在中国当下成为了黑色幽默。

究竟还有多少人保持回顾的本能和自觉？

仿佛人人都大瞪双眼气急败坏地往前猛冲——如同对人最重要的东西只在无目标的前边，并且所剩无几。后别人半步的话，这世界上的好东西自己就一点儿也捞不着了似的。

对于一个人也罢，一个国家也罢，“好东西”确实只在“前边”吗？“后边”就真的是一片虚荒，什么值得宝贵的东西也没有吗？

文化在人所未至的“前边”吗？

如果“前边”连文化尚且还不存在，那么真正的“一无所有”岂非恰在盲目的“前边”？

即使在某些还肯于“回顾”一番的人士中，那视线往往达至

80年代便中断了。在中国,太多的人连对70年代、60年代、50年代也不甚了了。有时简直一无所知。或者,越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一下子兴趣浓厚地“回顾”向清明元宋唐……去了。

又有几多人,愿以文化的眼,而非以洞察改朝换代之权谋手段的眼,对一个人物、一些人物、乃至我们国家的并不久远的史作回顾式的,文化解读式的瞭望呢?

多乎哉?不多也。

现在,我们有理由欣慰了——因为又增加了这样一部传记书。

此书足以延长当下人太短的回顾视线;对于那些习惯了“跳跃”回顾的人,是一种必要的视域补充。

我个人认为,就近100年的历史而言,文化之化人的魅力,在费孝通那样的人物们身上,才体现得尤为动人。

让此书引领我们回顾吧。

领略吧!

四

由费孝通而联想到了潘光旦。

师生二人,五七年都成了“右派”,“文革”中自然都被划入“另册”,饱受身心摧残与凌辱。

在那种邪恶的年代,老师潘光旦死在学生费孝通怀中……

其情形是令人唏嘘不已的,此不赘言。

仅想叩问一问——当别人被宣布为“政治 SARS”传染者了，只因为他曾是自己的老师，我们会否将他一整夜地搂在怀中以减轻他死前的痛苦；全不顾天亮了以后，我们自身又会罪加一等？

这种叩问，也包括是对我自己的。

一个人只有被文化“化”到了此境，才配是一位大写的文化知识分子。

我随此书的文字而回顾——但见一些发出着文化光辉的背影，仍在并不久远的史中前行，前行……

他们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我忧伤。

他们的背影，于自信的前行中重叠，重叠……

最终在我的回顾中叠印为一个我很熟悉的背影——费孝通的背影。

我明白，对于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的背影是他们自然生命的休止符。那光是他们的“文化舍利子”所发的。

我悲欣交集。

因为毕竟，回顾之际，那光照耀到了我——和我的思想；我的灵魂……

梁晓声

2011年5月6日

于北京

自序

—

本书所述,尽力存真。

动笔前,一次谈话中,费先生说:我想听听你打算怎么写。

即表如下大意:写人及史,最要紧处是真。一位学者,一门学科,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一层层背景铺开。述而不作,是怎么样就怎么写。能说真话的地方说真话,不能说真话的地方不说假话。把您的故事、心思、来路和去向,如实记录下来,为社会和后人留一些可信的史料。按我理解,您是在记录大时代的变化,我要做的是记录您的记录过程。您说过,社会学要讲故事。您用一辈子讲了中国从贫弱到小康的故事,您的传记应该是讲您用知识为社会进步服务的故事。

费先生说:我正在看我的美国老师的传记。你的想法,大概和这本传记(指 *Robert E. Park: Biography of a Sociologist*)的写法接近,叫“自然史”写作法, *natural history*。这样的写法不错。我不干涉你怎么写,所以不能帮你。我能做的是不催你、慢慢

来,尽量放开写。我现在就等着看你怎么写我了,骂我都可以,只要骂得有道理。

费先生的超脱,让我想起他的一篇文章《我看人看我》。

这是时常跳出现实作壁上观的费孝通。

二

人物传记,应尽量还原传主的文化生命史,以及与其相伴的一段社会变迁。如传主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还应注意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和过程。

最真切、最传神的“费孝通传记”,作者只能是费先生本人。这是一部已经载入史册的无字大书,其生命几乎跨越一个世纪。这部大书,经百年历史变局,山重水复,柳暗花明,风云际会,不仅好看而且引人遐思。

一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影响着费先生的生命过程。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费先生的思想和活动,也影响了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政治、文化和社会史某些篇章的书写。尝试着写下这些文字,实际上是在有限的视野、有限的时段中,观看并记录下这个互动过程的实时笔记。相对于费先生自己写入历史的无字大书,这点笔记充其量只能算一个索引,为有心了解费先生一生行迹的读者朋友,提供一些文字说明。

在这本书中,费先生所思、所言、所行,或来自有关史料,或出自传主口述,或是作者亲历,皆真实,无虚假,更不事演义编造。

这是负载着丰厚的中华文化和历史信息的费孝通。

三

曾有朋友劝说费先生，趁着脑子清楚，应该写本自传。

费先生表示，自己性喜写作，每个时期都留有文字，包括“反右”时的认罪，“文革”中的检查，其中自有历史。与其老来去回忆什么时候碰上什么样的人、说了什么样的话、做了什么样的事，不如把自己各个时期的文字放在一起看，这样更真实。

又有朋友建议，既然不愿作自传，那就找人写一本您的传记。

费先生表示，不打算找人写，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一语惊心！闻此话，想及多年随费先生作田野调查的一些经历。他本是作为学者走访，轻装简从，更利于接触实际，却因被官场作为“首长”的身份，每出行，到地方后，常前呼后拥。省、市、县、乡、村、街道、居委会、社区等，皆有陪同。接风、洗尘、宴请、饯行，占去大量时间，不堪其累。某年，费先生去中部地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庄访问农户，他乘坐的中巴车竟有七辆警车开道。

一个老教授走访乡村农户，弄成如此场面，他心里并不舒服。一次在南方，他问：那些警车“呜哇呜哇”叫，不是扰民吗？

这是人前热闹、内心孤寂的费孝通。

四

“冯唐易老，名位累人”，费先生在一本著作序言中写下这样的感慨。

面对出行中不胜其烦、又推脱不掉的接待场面，费先生说，

我去看他们，是诚意，想帮忙出点主意，让地方发展得快一点。人家接待我，是好心，不能慢待客人。所以，宴请的饭我不能不吃，还要表示吃得很高兴，吃过了才能去看农户。没有酒席上的客套应付，就没有实地访问的机会，我这是“认真地逢场作戏”。

一次调查途中，费先生在谈到跟随自己当学生、做助手的难处时说，我太厉害，对人的要求很高，很难做啊！我提个要求给人家，人家做不到会失望，心里也是很苦闷的。所以，我劝人家不要做我的学生。打击一个人，最厉害的就是让他自己失望。我说这话，都是有实际例子的。我要培养一个人，他承诺要达到要求，实际上却达不到，他痛苦，我也很痛苦。所以，最好不要跟我做学生，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最好。不是我找他，也不是有责任培养他，可他却学到了东西。我撒出去种子，让它自己发芽开花。假定我在那里干涉它，那就不合规律了，种子也许反而发不了芽。

这是善解人意、推己及人的费孝通。

五

1935年，为到广西作实地调查，费孝通写出“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计划”。他在计划中说，“择其与省行政上有密切关系之问题为主，并拟以客观态度贡献对待特种民族之意见，以备采纳”。

研究现实问题，保持客观态度，拿出具体意见，以备决策采纳，这是费孝通进行学术工作的初衷。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前言中写道：“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

为组织集体行动,对社会情况需要有一个多少为大家所接受的分析和定义以及一个系统的计划。……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

费孝通认为,这个国家的发展需要许多务实、勤勉、清醒的大脑,了解民生实情,善于找到办法,作出正确判断,向决策者提出建议。改革开放以后,他主张广开才路,广开言路,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初衷依旧。

这是起步就将学术研究功能清楚定位且一生不改初衷的费孝通。

六

推进“草根工业”发展,是费孝通毕生心愿之一。

早年,他在江村看到乡村工业萌芽,萌发希望;昆明时期撰写《乡土重建》,再三论证;1957年重访江村,重申主张;改革开放后再提乡村工业,大声疾呼。费孝通利用各种机会观察乡村工业发展实况,凭借调查到的第一手资料,顶住压力,苦口劝说。

在费孝通一步接一步的追踪调查中,草根工业从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草根工业的发展,增强了地方经济实力,提高了综合国力,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目睹草根工业在各地蓬勃发展,费孝通一路不停,从家乡苏南追到浙江温州,从长江三角洲追到珠江三角洲,从东南沿海追到西北山区。《故里行》、《温州行》、《南岭行》、《闽东行》、《包头行》、《甘肃行》、《临夏行》……费孝通边走边

看、边思边写，向读者讲见闻、述感悟。一篇篇行程报告集结起来，编成了一本书《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

费孝通一生著述等身，这是他字数最多的单本著作。该书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行”者意象的回环往复。从70岁到93岁，费孝通每年用于实地调查的时间都在三分之一以上。“行行重行行”成为其晚年生活和工作的重要方式。

这是总觉人生苦短、夸父追日般追踪中国社会变革的费孝通。

七

曾有不少朋友问，费老一年跑那么多地方，不累吗，他怎么那么喜欢跑啊？

费孝通的确跑了很多路，若说他就是喜欢这样，则未必。

1945年，费孝通写《初访美国》。开篇就说，我还是在乡下往来，还带传统的性格和成见，对于上海的嚣尘，香港的夜市，生不出好感。苏州长大的人，生活的理想似乎走不出：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懒散。

1985年，时隔40年还是本性难移。他在《社会调查自白》中写到，我是小镇上生长大的人，还是很喜欢镇上的茶馆。到那里坐着，喝一碗茶，下一盘棋。

1996年，到山东考察时来到泰山脚下，费孝通谈到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他说，如果能选择，我宁可回到农民的世界，享受和平的心境、稳定的生活和友好的环境。我会生活在一个熟悉的世界里，在宁静的环境、熟悉的人中找到和平和安全。

这才是费孝通天性中真正喜爱的生活。他看似好动，实则

好静。他明白，生逢大时代，一介书生怎么个活法，不是个人定位而是时代定位，正所谓“头顶星空，心中律令”。

这是一生向往田园生活而终未如愿的费孝通。

八

“我怎能不心急呢？我们这一代处在这一代历史的考验里！”这是费孝通 1945 年在《初访美国》一书中写的最后一句话。

“我怎么能安心在茶馆里喝茶呢？时代变了，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变了。”这是费孝通 1985 年在《社会调查自白》的演讲中所说的话。

“中国的生产力还不高，底子还不够厚，还有几千万农民处在温饱线以下，世界上还不安宁，有战争，有难民，想到这些，就坐不住了。”这是费孝通 1993 年在泰山脚下说的话。

心志如此，便不再去想“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了。费孝通的晚年，当过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新闻语言中称此职为“国家领导人”。要说晚年享享清福，条件再好没有。一次聊天，他说：“我的好处是没有把副主席、副委员长当成个官儿。有的人就真的有当官儿的感觉了。我是利用可以到处走走的条件搞我的研究，而且还有点劲道。虽然看不深入了，走到地方去看看，总比不看强。”

这是心忧天下、常恤民情的费孝通。

九

1980 年，费孝通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时已年届七十。